

睡衣曾经是上海的一个符号。

/本版图片除署名外,为晨报首席记者 杨眉摄

在上海作家马尚龙看来,“文明迎世博”只是减少睡衣现象的一部分原因。真正促使睡衣现象消失的,是居住环境颠覆性的变化。“旧房子大片地被拆掉,石库门和两万户都在消失。”

居住空间变迁,上海的睡衣文化渐渐消失

星期日周刊记者 李欣欣

好比电影里超人外穿的内裤。

爱穿睡衣出门的阿姨爷叔们为自己辩护时,也会以此为论据:“阿拉睡衣里是有内内裤的。那种露肩胖露大腿的吊带衫超短裙,就更加雅观吗?”

在阿姨爷叔们看来,“睡衣”只是个名称而已,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?

“上海人的‘睡衣’和欧美人的睡衣完全是两回事。”马尚龙说。

“西方人的睡衣里面是没有内衣的,材质透明飘逸。晚上洗好澡穿上,喝着红酒看着书。而上海人的睡衣是一种多功能衫,用途广泛,既能居家,又好外出。”

睡衣流行和居住条件紧张有关

那么上海这种可以外出的睡衣是怎么诞生的呢?

这与上海特有的弄堂生活息息相关。1955年出生的刘晓兰(化名)从小生活在上海老城厢——老南市区的小南门一带。

“我小时候从来没在马路上、弄堂里见到过睡衣。印象中睡衣是一个只会出现在电影和书本里的东西,高档洋气,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不搭界。”

“到了七八十年代,经济条件一点点宽裕起来,弄堂里开始有人穿着碎花样式的睡衣出入。最开始穿睡衣出门的人,脸上还有几分显摆的意思。在那个年代,穿睡衣还算是时髦的一件事。”

刘晓兰说,后来穿睡衣出门变得越来越普遍,弄堂口、菜场里总能看到一些阿姨,穿着一身睡衣,头发卷得出奇地好看。

“一些邻居会自己用缝纫机做睡衣。看上去去蛮随意的,实际上衣服的细节上有很多小心思,比如点缀蕾丝花边,用布店里最新款的

料子。”

马尚龙认为:“睡衣的流行,和七八十年代期间,上海市区居住条件紧张有很大关系。”

“当时一栋石库门里起码要住七八户人家,但厨房就一个。不管你住二楼还是亭子间,每天都要去厨房好几趟,随身还要带着钥匙、火柴、零散钞票,有两三个袋袋的睡衣最实用。”

“在家里,没有人舍得穿上班的衣服去烧饭,但如果只穿着汗衫短裤进出厨房,又太不雅观,经常还要下楼到弄堂口买买小葱酱油。睡衣打破了空间不断转换带来的尴尬,是名副其实的居家、外出两用衫。”

“刚开始,上海人自己把旧衣裳改成宽松的‘睡衣’。等条件好点了,商店里就能买到了。这样一来,弄堂里进出的人既避免了尴尬,还能维持一点体面,作为弄堂串门的着装也亲切。”

睡衣不仅适用于弄堂生活,在最早的工人新村,也是派大用场的。

“当年的‘两万户’基本上都是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间。睡衣既然能穿去厨房,也就好穿着去买小菜。到后来延伸到公交车上、电影院里,只要不是上班这类正式场合,都被睡衣慢慢覆盖了。”

大城市、小弄堂,为睡衣登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。

从小生活在永嘉路一带弄堂里的陈妍廷说,如果自己在马路上看到睡衣,首先会想到,对方肯定和自己一样,就生活在衡山路周围。

“因为你穿着睡衣,活动范围总归在一公里内,不大到会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。”

“穿睡衣上街”曾被认为不文明

如果说在七八十年代,身穿睡衣还有那么一点时髦的味道,到了90年代,“穿睡衣上街”的现象就开始被贴上“不文明”标签了。

1993年,新民晚报上出现了一篇“睡衣、睡裙莫上街”的文章,一场关于“穿睡衣上街”的漫长讨论拉开序幕。

为什么九十年代会出现这样的批评声音,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琪看来,这和观念的变化有关。

“过去大家司空见惯了。但随着城市不断更新,大家对‘得体’的理解发生了变化,就会有人将这种现象列入‘负面清单’了。”

到了新千年,穿睡衣上街变得越来越刺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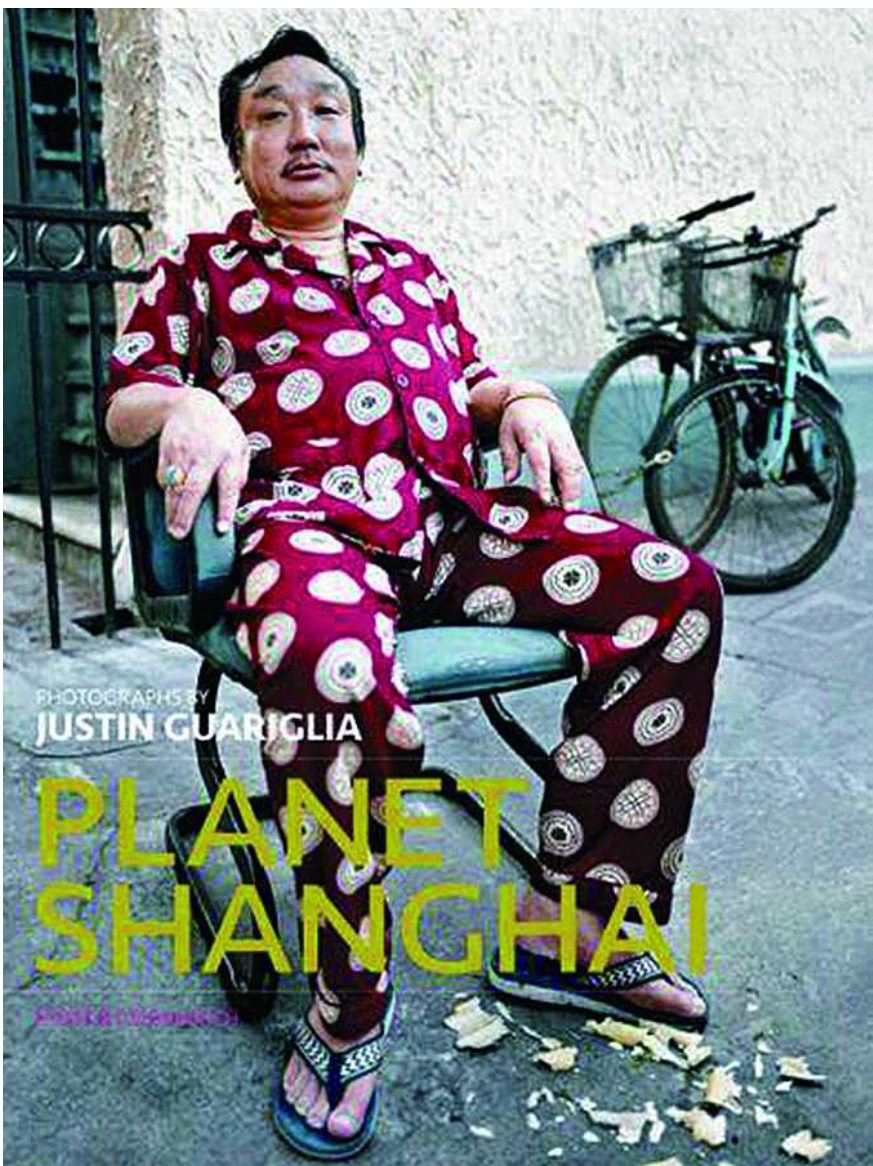
2000年,《新闻晨报》报道,浦东的七号桥小学搞了一次“我帮家长改陋习”的亲子活动,700多位学生投票选出的家长陋习中,“穿睡衣上街”这一项成功挤进前三。

报道中这样写道:“小朋友说,如果放学时,看到自己的家长穿着睡衣裤、带着发卷站在校门口,总感到很难为情。”

到了世博会前夕,“穿睡衣上街”更是持续被推到话题热榜。2005到2010年期间,短短几年里,各大报纸上和“穿睡衣上街”这个话题有关的报道,远超过一百篇。

在浦东世博园区周边的一些社区,志愿者们干脆组成“着装劝导队”,举着“睡衣睡裤不出门,做个世博文明人”的标语牌,见到穿着睡衣的人,便拦在小区门口,劝导他们回家换衣服。

“当时有个新闻我印象很深,有个志愿者阿姨在小区门口举牌子,劝说穿睡衣的人回家换衣服。滑稽的是,举牌子的人自己就穿着



摄影集《行星上海》封面

一身睡衣。”马尚龙说。

当时话题有多火呢?境外媒体也来凑热闹,在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尔街日报》、《波士顿环球报》的相关文章中,作者们争相为上海的睡衣文化“打call”。在他们看来,“睡衣是上海街头文化的一种标志”,甚至认为是“当地最为独特的风俗之一”。

不光是公开的报道,2008年,美国摄影师贾斯汀·瓜里利亚(Justin Guariglia)还出版过一本名为《Planet Shanghai》(行星上海)的摄影集。图片的主角就是上海街头身穿睡衣的市民。

摄影集的封面是一位身穿大红睡衣、戴绿玛瑙戒指的中年爷叔,踩着夹脚拖,富态地嵌在一张路边的旧办公椅里。贾斯汀接受采访时说:“每一个西方人都对‘睡衣时尚’充满了欣赏甚至嫉妒,我们也向往能像上海人一样,穿着睡衣度过一天。”

“上海的睡衣游戏结束”

这场热烈的辩论多少带来了变化。世博会刚结束,新民晚报在一篇名为《上海世博会改变了什么?》的文章里面专门提到,“睡衣族”上街的现象明显减少了。

据2010年老卢湾区一份调查报告显示,居民认为,迎世博8年改善最明显的陋习中,“穿睡衣上街”排名第二。

不过在马尚龙看来,“文明迎世博”只是减少睡衣现象的一部分原因。真正促使睡衣现象消失的,是居住环境颠覆性的变化。“旧房子大片地被拆掉,石库门和两万户都在消失。”

离开弄堂,住进“1.0版本”小公房,再搬进煤卫独用的升级版公房或商品房,这是近半个世纪里,许多上海人的生活轨迹线。

今年64岁的刘锦云(化名)也依循着这条轨迹。“六七十年代我们住在虹口的石库门弄堂里,水斗炉子都是公用的。出来装盆水还要换件衣裳,肯定不现实,那时候大家都穿自己缝制的睡衣在弄堂里活动。”

“八十年代我们搬到平凉路的公房里,一



2009年11月,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来沪,被问及对“穿睡衣外出”怎么看。

条走廊七间房,有七户人家。头两年煤气还没有接进来,大家就在走廊上摆只小炉子烧饭,一道说说笑笑,穿睡衣去串门,也蛮自然的。”

“1998年,我们住进了浦东独一无二的公房。刚搬家的那几年,小孩还在上学,每天的生活跟打仗一样,经常穿着睡衣一路小跑去买小菜酱油。后来小孩大了,我们也退休了,每天笃悠悠爬起来,加上邻居不再串门了,没必要穿睡衣。小区出门走十分钟就是陆家嘴,那么体面的地方,穿个睡衣在摩登大楼下晃,难看伐?”

随着刘锦云这一代人开始抛弃穿睡衣出门的习惯,曾经风靡一个时代的睡衣文化也就大幕落下了。我们发现,最近几年,公共媒体上和这个话题有关的文章寥寥无几。

视线回到2010年5月,正是“穿睡衣上街”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。当时《纽约时报》上刊登了名为《上海的睡衣游戏结束》的文章。

作者写道:“上海黄浦江畔的历史建筑还会在那儿屹立很长时间,88层高的金茂大厦亦是如此。不过随着人人都搬进宽敞的现代公寓楼,街头睡衣的景象可能会逐渐消失。”

“到那时,一些时装设计师也许会让模特穿着睡衣上T型台——而台下的观众也会大声鼓掌叫好。”

九年过去了,这位作者的猜测,正在成为今天的现实。



长辫子爷叔不仅睡衣里有内裤,睡衣外又套了背心、围兜。 /晨报记者 李欣欣 摄



对上海人来说,弄堂是半私密的空间没必要穿得一本正经。 /邵剑平摄



上海人的睡衣文化是在弄堂生活的滋养下发展出来的。



襄阳南路上穿着成套睡衣的上海爷叔。



(欢迎关注星期日周刊微信号“上海市民生活指南”,SHerLife)

内衣款外出服

穿行于上海街头的睡衣一族,总能让人一眼辨认出来。

它有几个标志性的特征。首先,必须是一套头,统一式样的衣服加裤子,经典的小碎花款式是主流。

衣服两侧一定要有个口袋。夏天的男士睡衣还要多一个袋,位于左胸处,用来放纸币、手表、打火机。冬天的睡衣多半要搭配上更加花哨的罩衫、袖套,防尘防晒。

其次,衣服的袖口和领边处,要有一圈和衣服同色系,但更深一个色号的滚边。比方讲,一套紫色碎花睡衣,它的滚边一定是深紫色的。要是男士穿的蓝色睡衣,就会镶一圈深蓝色滚边。

碎花一套头、两只口袋、深色滚边,这三大元素一碰撞,就构成了睡衣的鲜明特色。当然,最关键的是,这种可以穿上街的睡衣,夏天款的里面肯定有内衣裤,冬天款的还有棉毛衫、棉毛裤做内衬。

其实,它更像是一种“内衣款外出服”,